

“洋猪”遍地 养殖效率低下

生猪养殖一年消耗一亿人口粮



粮食浪费惊人

最近，湖北省一些生猪养殖户发现，市场上本土猪种越来越少，绝大部分都是国外引进品种。这些引进品种产仔率虽高，但死亡率也明显更高，生猪变得越来越难养了。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遇到的这一问题正是困扰我国养猪业的大难题。

在武汉市汉阳区养猪 20 多年的刘树来说，近年来，他饲养的杜洛克三元杂交猪长到 100 来斤时，稍有疫病就可能成批死亡，一批 300 多头猪中一次会死二三十头，“以往本土猪种患病打些青霉素就能好，现在这些洋猪用再好的药也不见效。”

中国畜牧业协会副理事长王振华说，相对于本土猪，外国生猪品种具有日增重快、瘦肉率高等优点，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我国开始批量引入国外瘦肉型猪种。相对于高成本、高技术的长时间驯化改良种猪，直接引进种猪繁殖品种增重快、产仔多、相对经济效益高，因此大部分种猪场情愿直接引种推向市场立即获益，而非进行改良选育。但这些种猪的后代很容易退化，并易出现成活率低等问题。

据介绍，急功近利地大规模盲目引种，

使我国种猪年平均进口量从 2000 年至 2007 年间的 2100 多头，到 2008 年达到近 1.2 万头，2012 年高达 1.8 万多头。目前国内饲养的生猪中，基本被杜洛克、大约克夏、长白三种国外种猪杂交品种垄断，所占比例超过 70%。

华中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喻传洲说，由于近 10 年来大规模引进国外种猪，生猪死亡率上升，导致国内母猪养殖效率低下，国内母猪年提供的出栏商品猪数量整体明显下降。要维持我国当前年生猪出栏量，必须养殖 5000 多万头成年母猪，而美国、丹麦等养猪强国，每头母猪年提供出栏猪数量在 20 头以上，“要是能达到这样的养殖效率，我国仅养 3500 万头母猪就行了。”

猪死亡率高、养殖效率低，更是带来惊人的粮食浪费。王振华说，一头生猪长到 100 斤时，包括母猪繁殖用料在内共需消耗饲料 400 斤。目前，1 头母猪年提供出栏猪数量从 2005 年的 16 头下降到 14 头，每年减少的两头生猪出栏量绝大多数在 100 斤左右死亡，相当于一头母猪每年浪费粮食 800 斤。以当前全国 5000 万头母猪计算，我国因生猪养殖效率低下造成的粮

食损失高达 400 亿斤，相当于 1 亿人一年的口粮消费。

“洋猪”带来三大隐患

据业内人士分析，我国种猪长期依赖进口，以及“重引种、轻选育”造成的“洋猪遍地”现象，严重制约我国走向养猪强国，且对我国生猪产业带来三大隐患：

一是推高养殖成本。“洋猪”死亡率高，成为我国生猪养殖成本上升的一大推手。刘树来说，一年死 30 头就得净亏上万块饲料钱，这些都得摊入养殖成本。武汉天种畜牧公司副总经理刘师利介绍，一些养猪强国养猪成本在人民币 5 元/斤左右，而我国由于生猪存活率低，每斤养殖成本高达 7 元，“这直接推高了老百姓餐桌上的猪肉价格”。

二是带入疫病。面对引进国外种猪带来的丰厚短期利益，国内不少种猪场争相引进，一些猪场正规途径难以实现便通过走私等方式引种。加剧了蓝耳病、圆环病毒病等生猪疫病的传播。

三是容易与人争粮。长期以来，我国猪与人争粮的矛盾始终存在。国内传统的农副产品和分散式饲养模式，由于饲料的营养价值和转化率不及玉米、豆粕和鱼粉，国外猪种难以适应。而适宜玉米-豆粕型饲养的国外猪种，在国内规模化养殖后，带来的是玉米等粮食需求的激增。

养猪大国不是养猪强国

作为传统的猪肉消费大国，我国目前已成为养猪大国。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2 年末我国生猪存栏 4.7 亿头，出栏 6.9 亿头，猪肉产量 335 万吨。专家表

示，随着我国人口复合增长率与城镇化率的双重增长，未来 10 年猪肉需求量仍将保持 2%~3% 的年增长速度，因此加快从养猪大国向养猪强国转变意义重大。相关部门未来需要采取积极措施，扶持选育适合我国的种猪，打破当前种猪领域“引种-退化-再引种-再退化”的恶性循环。

首先，要加强管理制定育种战略。种猪行业人士建议，调整现有种猪选育“以洋为主”的思路，大力普及风土驯化洋品种对我国生猪产业的重要性；加强对相关机构、企业的管理，有效遏制种猪依赖国外引进的现象；学习借鉴国外引进种猪培育适应本国环境高产高效品种的成功模式和经验，制定选育种猪优良品种战略，从品种源头提高我国生猪养殖效率。

其次，健全优质种猪选育体系。王振华说，应改变当前国家支持种猪选育项目主要落在科研院所的现状，采取降低企业申报种猪选育支持项目门槛、给予金融贷款政策扶持、培育种猪选育龙头企业等综合手段，形成种猪选育政府大力扶持、企业积极参与、科研单位指导的局面，加快适合国内生态环境和饲养模式的种猪品种选育进程。

最后，培育行业组织加快整合。刘师利认为，目前国内各类大小种猪场共有 5000 多家，综合实力良莠不齐，市场整合与兼并进展缓慢，容易发生恶性竞争。建议相关部门大力培育种猪行业组织，通过制定行业协会规定加强行业自律、搭建企业沟通平台等举措，加快种猪市场的资源整合，鼓励育种、养殖、屠宰、加工、销售企业相互参股、持股，借助资本纽带降低生猪行业交易成本，加快优良品种市场推广普及步伐。

徐海波

日本跨国粮商潜伏 30 年 控制中国近两成大豆进口

在过去约 30 年的时间里，日本丸红株式会社 (Marubeni, 下称“丸红”)、全农 (ZEN-NOH, 全称为全国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等跨国粮商，在国际粮食市场后来居上，实力直逼传统的 ABCD (ADM、Bunge、Cargill、Louis Dreyfus) 四大跨国粮商。丸红的数据显示，在中国每年的 6300 万吨大豆进口量中，该公司的销售量达到 1200 万吨，占据 19% 的份额。

弹丸之地成就跨国粮商

2012 年，丸红出资 36 亿美元收购美国第三大谷物及能源交易商 Gavilon Holdings 的全部股权，收购后丸红一年的大豆和玉米等谷物经营量将超过 5000 万吨，超越 ADM、Bunge、Louis Dreyfus，规模仅次于全球最大的 Cargill。

以国土面积计算，不到 40 万平方公里的日本只能算作弹丸小国，但是对国际粮食市场的影响力远远超过粮食生产大国中国。

2013 年，中国粮食自给率在 90% 左右，但是全年大米出口量 47.84 万吨，玉米出口量 7.76 万吨，尽管是全世界最大的大豆进口国，但是对国际大豆市场的影响微乎其微。

与中国相比，日本粮食自给率几乎“无颜见人”，整体的粮油自给率只有 40% 左右，饲料几乎全部从海外进口。不过几大日本跨国粮商对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却让中国公司望尘莫及。

2012 财年，不算 Gavilon Holdings，丸红的谷物事业每年经销量高达 2500 万吨，高居日本综合商社之首，经销量规模位居世界五大谷物巨头之后。

全农每年船运的玉米、大豆、小麦等农

产品总量达到约 1200 万吨，每年经全农之手出口的玉米、大豆、高粱总数达到 1100 万吨，是中国全国出口量的约 20 倍。

日本粮商的崛起之道

生产的粮食还不够本土吃的日本粮商，是怎样在国际市场上风生水起的？

日本公司很早就意识到了农产品供应不足的问题。日本的粮食几乎都依靠海外进口，80% 左右的饲料原料要靠进口解决。保

证本国粮食的稳定供应，是日本粮商要解决的头号问题。

1970 年，全农参股的 CGB 公司在美国粮食主产区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成立，当时只有 3 名职员。今天，CGB 公司在全球有 95 个分支机构，超过 1500 名职员，业务领域包括向农户提供金融和风险管理服务，购买、存储、销售和运输农作物。

除了 CGB 公司，全农在美国还设立了全农谷物公司，建设并且加强玉米船运的基础设施，同时全农在美国西海岸，还与美国最大的农业合作组织 CHS 合作建立了一套谷物采购和出口的系统。

在美国之外，全农与阿根廷的 ACA (供应玉米、大麦、高粱等)、巴西的 COAMO (供应大豆、玉米)、澳大利亚的 CBH (供应大麦、小麦、高粱、牧草等) 和欧洲的 INVIVO (玉米、大麦、小麦、甜菜等) 等海外农业合作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

这样全农在世界最大的粮食出口国美国以及世界主要的粮食产区南美洲、欧洲、澳洲都建立了自己的粮食收购和仓储物流体系，不仅能买到粮食，也能运出去，从而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粮食的跨国流动。

丸红在国际粮食市场走过的路与全农

延伸

中国粮商学什么？

的海外投资只能算赶了个“晚集”，但毕竟迈出了第一步，能不能出现中国的丸红或者全农，业内人士并不看好。

一位在跨国粮商工作过的人士表示，中国不缺乏聪明才智之士，但是缺乏世界级跨国粮商管理团队。跨国粮商的高管团队是市场化的精英团队，跨国粮商以全球为市场，广泛招贤纳士，不分国籍、性别，这在中国央企行不通。中国能够走出国门与丸红、ABCD 等跨国粮商抗



相似。

丸红旗下的哥伦比亚谷物公司，1978 年于美国波特兰公司具有 100 万吨的谷物处理能力，使其在美国西北部沿太平洋地区的谷物市场成为领导者之一。

现在，他们通过收购美国的 FGDI 公司，拓展到更东部的大豆、玉米产区。

而对 Gavilon Holdings 的收购，使丸红如虎添翼。丸红获得了该公司在全美拥有的约 140 个谷物收购点，以及该公司在巴西、澳洲、乌克兰等美国以外的主要产地配备的基地。

胡军华

衡的高管团队不多，央企内官僚、半官僚的色彩浓厚。而受大环境影响，央企自主权有限，央企走出国门，仍然需要得到政府的批准。

与日本企业走出去不同，一些中国公司和个人在探索海外买地或者租地形式，在海外自己搞种植，对于这样的模式，业内人士并不认为是最佳方案。业内人士说：“海外农业应该以合作为主，充分利用当地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而不是租地或买地，那样会引起所在国国民和政府的高度警惕，从而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阻力和障碍。”